

# 大生档案亚太记忆申报书的填报

□朱江

在疫情条件制约下,评委到现场查阅档案的机会比较少,往往通过申报书来评判是否符合申报的条件,某种意义上申报书是申报成败的关键。



申报书的填报是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申报的核心环节,概括和提炼出档案的核心内容与价值,是申报书填报的要求。在疫情条件制约下,评委到现场查阅档案的机会比较少,往往通过申报书来评判是否符合申报的条件,某种意义上申报书是申报成败的关键。

田形教授曾与章开沅先生合作出版过专著《张謇与近代社会》(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),对于张謇引领的南通早期现代化的探索,包括工业化的特点、农业的早期产业化经营、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体制等有全面而独到的阐述。田教授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,曾在南通市档案馆全面查阅了大生档案,对大生档案情况非常熟悉。2016年,南通市档案馆启动大生档案申报亚太记忆工作,田教授先后两次从武汉赶到南通进行指导。无论是从对大生档案的了解程度,还是张謇研究的理论深度,以及对南通的感情出发来衡量,田教授都是申报顾问的第一人选。

申报书的概述部分,要求“简要描述申报的文献遗产,并说明推荐理由。包括手稿、文件、影像等文献遗产的类型。突出申报的文献遗产的本质、独特性和重要性”,是整个申报书焦点所在。在持续的沟通中,概述部分不断精进。特别是5月20日之后,国家档案局交流合作司直接对申报书填报进行指导,要求突出大生纱厂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关系。在大生纱厂的定位方面,田教授提出的“1895年创建的大生纱厂是中国及东亚棉纺业萌芽期的龙头企业”得到普遍认同,后来各大媒体,包括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、中央电视台等在新闻稿中,都采纳了这个观点。

申报书6.3“目录或登记详情”部分要求:“申报的文献汇集或档案全宗必须是有限的,有清晰的起止日期。如果目

录或登记详情太长,请提供带有目目录示例、利用或登记号码范例的内容介绍。或者也可将目录或登记详情作为附件,或提供线上详细目录的链接。”这部分的填写花费了很多精力。我和同事朱慧仔细、反复研读了大生纱厂早期形成的档案,确定其中的205卷作为申报档案。根据档案形成的时间,明确申报档案的起止日期为1896年至1907年。

申报书挑选的150条示范卷内目录,分股份制运作、建造厂房、机器安装、驻沪事务所、经营投资、购买物料、设立分厂、经营航运、教育慈善等9个方面。示范卷内目录的呈现,一方面要反映大生纱厂创办初期的基本面貌,印证申报书提出的观点,如“大生纱厂的成功创办与运营,是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智慧与世界先进技术设备、企业组织形式相结合的硕果”。另一方面要与申报书其他部分内容相兼容乃至补充,如申报书的第10部分“性别”提出:“性别平等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两大全球首要目标之一。如果申报项目中有任何关于性别平等的方面,请详细说明,描述申报的文献遗产如何讲述了亚太地区妇女和女童的生活,以及对于本区域的女性和女童或者性别平等有何影响”,我们挑选了1906年的《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初办章程》、1907年大生纱厂为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办理事务的账册、1907年大生纱厂致驻沪事务所关于上海事务所员工捐助南通新育婴堂250元的第153号信等。

档案文献讲求流传有序,完整的形成和保存历史有助于其真实性的考证,亚太记忆申报书前后有两处涉及这个问题。第一处是6.5“历史/起源/背景/出处”部分,要求“陈述文献遗产的历史,其‘生命历程’或出处,即文献从产生到入藏本机构的过程。这对于文献的真实性非常关键。如果不知道所有详情,则尽



1898年12月23日,江海关为大生纱厂运输煤炭颁发给船主金长顺的护照,原件藏南通市档案馆。

可能全面地描述文献的出处。”第二处是7.“真实性和完整性”部分,询问“文献遗产呈现的是否是其本来的面貌?”

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。包括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在内的大生档案本身的历史,正是我从2006年开始就着手研究的问题。我通过走访当事人、实地寻访、查阅档案、翻阅资料,基本厘清了大生档案的来龙去脉,在拙著《大生档案》中有详尽的分析。在申报书中,我们是这样叙

述的:“大生纱厂的创办人张謇具有强烈的档案意识,1897年制定的大生纱厂‘厂约’中,明确规定钱总房户为档案管理的部门,从筹备伊始就注重档案的积累和保存。‘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(1896—1907)’是在大生纱厂的生产、经营和管理活动中自然形成的历史记录,系统地反映大生纱厂早期历史。1962年3月,这部分档案由大生纱厂移交给江苏省南通市档案馆”。

(作者单位:南通市档案馆)

## 掘港·蟠山·玳浦

□徐继康

据《淮海纪略》《皇朝文献通考》《皇朝经世文编》等等。至于文人记述,更是数不胜数。

孙觉的诗,描述了北宋时掘港驻军的情况,在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中也有“留学僧到守捉军中季赏宅停宿”的记载,可知在唐朝,掘港就是一个军事要地了。历代朝廷都在掘港设有兵营,明代为了防倭,还添设了总兵参将衙门。

翻开一本本《如皋县志》,从明代嘉靖到清末,历任掘港营的储备、千总、把总的姓名,都记录得清清楚楚。在雍正十年,掘港营的长官还升设为都司,为正四品的绿营武官。掘港,在海防中的位置很重要。

掘港还是一个盐场。管劲丞先生考证:“掘港场在绍兴中吴蠩《裁并诸场奏议》中,被称兵火以前旧场,当设置于北宋中叶。”其后,东陈场并入掘港场,为海陵监辖“南四场”之一。南宋称催煎场。元至元十四年(1277)隶两淮都转运盐使司。明洪武元年(1368),隶属两淮都转运使司通州分司,为“上十场”之一。盐场的主管是场大使,是盐官中最小的一级,但掘港场的分量一点也不比掘港营小。

雍正九年(1731),因海岸线东移,面积加大,人口增多,又距县城太远,清廷添设了如皋县主簿一人,就驻于掘港。掘港场一下子热闹起来。

有人把掘港称为掘浦,比如熊琏《澹仙诗话》卷三中,有“仪征吴苍崖孝廉鹏孙为人负意气,尝建义学于掘浦”“子古

廷璧客掘浦,与吴竹亭友善”的记述。还有喜人称之为“掘港”,镇江大诗人鲍皋,他与掘港一个叫程鄂士的人关系很好,有多首诗写到他,必写为“掘港程鄂士”。

掘港的别称中,当数“蟠山”最有名。在旧时掘港八景中,有一景“蟠山晓日”。蟠山之名,始见于康熙十五年(1676)的《如皋县志》:

蟠山,亦名车釐山,在掘港之苴上,土人取车釐,弃壳海滨,累积成山,高十余丈,上耸一峰,外相环带,望之若浮峦孤屿,出没云涛中,初日照耀,金光迸射,雅称异观。

《大清一统志》中,也有对蟠山的记载。蟠者,蟬蛾也,即今之文蛤,掘港近海,盛产此物,乡人好之,食毕弃壳于海滨,堆积如山,遂以名。至若“望之若浮峦孤屿,出没云涛中”等语,那是文人的雅称异观。

《大清一统志》中,也有对蟠山的记载。蟠者,蟬蛾也,即今之文蛤,掘港近海,

盛产此物,乡人好之,食毕弃壳于海滨,堆积如山,遂以名。至若“望之若浮峦孤屿,出没云涛中”等语,那是文人的雅称异观。

有人把掘港称为掘浦,比如熊琏《澹仙诗话》卷三中,有“仪征吴苍崖孝廉鹏孙为人负意气,尝建义学于掘浦”“子古

廷璧客掘浦,与吴竹亭友善”的记述。

赵曾望很有意思,这个晚清民国侨寓掘港几十年的丹徒人,总是喜欢把蟠山写为玳山,

他在《江南赵氏楹联从话》中说:“丙戌、丁亥间,余供职京华,仅携一仆,妻孥仍居东海之掘港场,余集中屡称玳山者是也。”他大概是嫌弃“蟠”字为虫旁,不雅,就改成了玉的“玳”字。这是文人的癖好,大抵与通州人改“狼山”为“琅山”是同一趣味。他还喜欢用“玳浦”一词,如“玳浦碧霞山,余初游时有红梅一株,花朵烂开,色若丹砂,同人啧啧称赏。后为蠹蚀其根,遂萎,山间少一胜景矣。”文字美极了,让人印象深刻。他的“玳浦”与李磷称栟茶为“茗沙”,都是独一份。其实,“玳浦”与碧霞山的红梅一样,都属于电光一闪,后来没有人见过。

有人以为蟠是繁体字,每当报纸和文稿中出现这个字,而电脑里又没有,总是用“虫十宀”拼合而成。他们不知道“蟠”从来没有简化过,他们总是按照自己的理解,硬是做了一个大错字。拼字很麻烦,有人干脆用“宾”字来代替。如今,满大街都写成了宾山,宾山照相馆、宾山医院、宾山水城,甚至蟠山小学也写成宾山小学。在掘港,很难找到一个“蟠”字喽!从“蟠”到“宾”,就发生在近十几年间,算是肉眼可见的速度。

掘港镇被更名为如东高新区,“掘港街道”成了下辖的三个街道之一。这个从唐朝留下来的名字,成了一个渐渐被淹没的孤岛,水面只剩下一片音符。多少年后,当后人从书本里读到掘港这个隐藏已久的地名时,会不会就像从镜里突然看见一个陌生的背影?

## 清官循吏朱兆蓉

□白本 陈红

朱兆蓉不仅是篆刻家,还是清末时期的一位清廉官员,颇有政声。他童年好学,既冠乃补博士,乡试荐而未售,旋停科举。《朱氏家谱》记述,他通过举孝廉,授中书,1892—1900年,朱兆蓉先后任职于湘鄂浙各地。1900年,他随慈禧、光绪西逃,躲避八国联军。是年,他出任长安转运使,奉檄运粟入陕。包兰瑛作《题外子长安转运图》:“黄沙猎猎吹白草,一鞭万里长安道”;诗人天虚我生吟道:“豆粥难分帝子忧,西

来不待鹤同游。策鞭人比鞭丝瘦,蕃马一嘶天地秋。”朱氏记有《长安转运日记》,始于光绪庚子年(1900)十一月初一,止于光绪辛丑年(1901)三月二十日。日记所录为证,朱兆蓉抱病工作,实属不易:庚子十一月二十日,天寒欲雪,朱氏病不能起,当日仅食粥一碗;翌日,朱氏头疼加剧,服柴胡葛根汤;二十二日,朱氏带病祭祀江神。朱兆蓉此行,环境恶劣,车马劳顿,又遭遇匪徒,种种艰辛,皆跃然诗文之中。

朱兆蓉出兵讨伐,亲自参战,九死一生。不

足一月,盗匪惨败。士民歌颂朱兆蓉的政绩,撰文勒石,以示后人。他还重视农事,劝农兴学,创建农会。朱兆蓉常常微服私访,深入老林穷谷,以便因地制宜,规劝农民改种作物,获得成功。辛亥九月,浙事未定,五雷山余贼趁机报复,大举劫狱,朱兆蓉率领勇士,一举歼敌。辛亥革命爆发,杭州新军推举政治家、实业家汤寿潜(1856—1917)为浙江军政府都督。汤氏赏识朱兆蓉的才华,知他为官清廉,遂令他续任遂昌知事。不幸朱兆蓉罹患疾病,只能请辞,迁居杭州疗养,以琴自娱。



## 古通州的野生哺乳动物

□达少华

这里所说的古通州,是指周世宗显德五年(958)南通筑城建州起至1912年改州设南通县为止的这一段行政建置,以便与现代的通州市、通州区相区别。古通州濒临临海,植被茂盛,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,其中的野生哺乳动物也有相当多的种类和数量。陆生的有老虎、麋鹿、鹿、狼、猕猴、獐、狐狸、猪獾、貉、刺猬、兔、黄鼠狼、蝙蝠以及老鼠等。水生的有鲸类、白鳍豚、江豚、海獭和水獭等。

南通旧方志中从唐代开始就有老虎的记载。明嘉靖《通州志·物产》中记载:“军山多虎蛇,人不敢至。”说明这时狼山地区仍然有野生的老虎。而在万历《通州志·物产》中已经没有了老虎的记载。

麋鹿,也写作麋,俗称四不像。从文献资料中可以见到,古通州的地上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麋鹿。晋张华《博物志》中记载“海陵县多麋,千万为群”,南北朝陶弘景也记述“今海陵最多,千百为群”。“千万”和“千百”虽是概数,但也清楚地说明了野生麋鹿野外衰减的速度太快了。

旧方志中常将鹿与麋鹿写在一起,如清乾隆《直隶通州志》中记:“生于草泽之交者:麋、獐和鹿。”清《海曲拾遗》中也记:“麋鹿善居泽,鹿因与居亦善济水。”说明鹿和麋鹿一样都能在水中生活,是水陆两栖的野生兽类。这些记述中均提到了鹿,还有野生的獐。鹿,有人认为就是鹿,即黄鹿,一种小型的鹿,与獐一样,数量很多。嘉靖《通州志》中记载:通州每年进贡獐七只、獐皮四百七十张、鹿皮羊皮各一百五十张。嘉靖《海门县志·岁进》也记载:“岁进,鹿一只、獐二只、兔三只”,“岁办,鹿皮五张、獐皮一百六十张”。万历《通州志》中也可得到证实:“毛之属,鹿、麋、獐、兔、獾、獭”,把鹿和麋从顺序上区别开来。否则写成麋鹿,又没有标点,那就分不清一种还是两种动物了。乾隆《直隶通州志》记载:“狐、兔、獾、狼”“生于野”;“生于草泽之交者”有麋、獐和鹿;獐、兔和黄鼠则居于“穴室”。

《海曲拾遗》中还有一些小型野生兽类的记述:“猪獾,彘毛较狗獾略长。狗獾似小犬而肥,二种皆喜穿穴堡墩邱陇中,取肉煎油可治湯火灼伤。皮温,更宜为裘。”“刺鱼即猾,产草薮间。”“蝎,性狞钝,少犯近则蜷缩,毛刺攢起如矢。”光绪《通州直隶州志》记述了通州野生哺乳动物的名称,有“麋、鹿、獐、兔、獾、狐狸、狼、獭”(形如猪,褐色,贊毛如粟房)、鼠、黄鼠(须及尾可制笔)”。黄鼠应该就是黄鼠狼,学名黄鼬。

古通州大地上唯一的能够在空中生活的小型哺乳动物是蝙蝠。光绪《通州直隶州志·杂记》中说:“万历中,一夕蝠堕地,死者以千数。”可见蝙蝠的数量很多。

水生兽类最大的是鲸类,包括须鲸和齿鲸。古通州地处南黄海,时有“巨鱼”搁浅海滩的记载,旧方志中记为“闰鱼”,如明万历《通州志·物产》中记载:“闰鱼,闰年自海出,骨可为桥。”文献中最早记载古通州海潮鲸类搁浅事例的,是宋代刘斧《青琐高议》中的《巨鱼记》就是写的鲸在通州海滩搁浅的情况,从文中的描述可以推测,搁浅的当为须鲸类。

白鳍豚,是国家级的水生哺乳动物,俗称白江猪。早在《尔雅》中就有记载,说它“大腹,喙小,锐而长,齿罗生,上下相衡,鼻在额上,能作声,少肉多膏,胎生,健啖细鱼。大者长丈余,江中多有之”。可惜,白鳍豚现已濒临灭绝!

江豚,俗称江猪、海猪和海和尚等,明朝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:“江豚生江中,状如海豚而小,出没水上。”

关于水獭,乾隆《直隶通州志》中说:“生于水滨者曰獭”,这个獭应是指生于淡水中的水獭。《海曲拾遗》中记述水獭具体而生动:“獭,一名水狗,四足俱短。头与身尾俱扁,毛色若紫帛。大者身与尾长二三尺,居水中,能取鱼为食,且能吐沫引水鸟食之。出水则常休于木上,在水呼为水獭,在木呼为木獭。又有海獭……”另《南通州五山全志》中记载狼山有“獭鱼洞”,说“昔海绕洞口,獭鱼常随潮潜入……獭门,当黄泥、马鞍二山对峙处中断成洞,海獭常随潮出入为门户,今沙涨为陆”,这说明古通州既有在淡水中生活的水獭(木獭),又有在海水中生活的海獭。



## 培园传家楚桥印

□三青

“颐园水绘尽荒湮,珍重林居小洞天。花里图书三万轴,壶中日月八千年。”这是如皋朱霖描述林梓培园的诗句。朱霖(1790—1877),潮桥人,诗人,篆刻家朱兆蓉的祖父。他与林梓沈廷荣(字梅垞)是好友。彼时,如皋城内冒氏水绘园、沈氏颐园,皆已萧索,倒是沈家位于林梓的培园别有洞天。朱霖造访友人府邸,留下佳句。

熟稔培园的何止朱霖,他俩还有一位共同友人黄楚桥。黄楚桥还为培园主人篆刻过一枚小章——田黄石太狮少狮纽“梅垞”印。此印为朱文印,边款为“楚桥为梅垞先生篆,辛卯九日”。刻印时间为道光辛卯年(1831)重阳节。黄氏时已年近古稀,所刻朱文为小篆异体字入印,又字框分离,属于东皋印派印风,但不及黄氏早年所刻白文印。不过此章石料极为考究,为田黄石,通体呈金黄色,又有萝卜丝纹,质感细腻。石头上面还雕有两只狮子,一个太狮,一个少狮,既象征人丁兴旺,又谐音“太师少师”,寓意代代为官。印章的价值,主要看石料。这方黄楚桥篆刻的“梅垞”印也一直由沈家人世代相传。

友人陈校长是沈梅垞后人沈幼征教授的侄子。他自幼跟随沈教授生活。本世纪初,陈校长母亲离世,他整理遗物时,还发现一张印花,所拓印文正是黄楚桥篆刻的那方“梅垞”朱文印。他回忆20世纪50年代,林梓地区兴办大食堂,他们搬家挪地,不少家传物件,至此丢失。不过是否有这方章,他也难以确定。20世纪90年代,这方“梅垞”印又在林梓出现,被几位如皋古董贩子倒卖给上海人。2013年嘉德秋拍,黄石太狮少狮纽“梅垞”印再次现身,终以1100多万元成交。培园早湮,金石永固,保存下林梓文人的交游往事。

## 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老建筑、历史人物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